

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再阐释及其当代价值

陆小天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6日

摘要

科学抽象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首先, 明确抽象法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抽象力实现从感性具体到思维具体的飞跃。其次, 与传统的理论思辨不同, 抽象法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最后, 在当代价值层面, 科学抽象法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

科学抽象法, 感性具体, 思维具体, 经济建设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Scientific Method of Abstrac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Xiaotian Lu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Received: April 22, 2026; accepted: May 16, 2026; published: May 26, 2026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abstrac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Marx's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First, clarify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method of abstraction involves realizing a leap from the sensuous concrete to the thinking concrete through the power of abstraction. Second, unlik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the method of abstraction is a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Marx's materialist dialectics. Finally, at the level of contemporary value,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abstraction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ing the inherent unity between Marxist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Scientific Method of Abstraction, Sensuous Concrete, Thinking Concrete,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持续关注和深入探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的方法：科学抽象法。然而，由于经典文本的复杂性和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国内外学者对科学抽象法的解读均呈现出诸多分歧。

早期学者如马克斯·韦伯和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推演，忽略了该方法的辩证过程[1]。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立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指出该研究方法强调的是“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逻辑演进[2]。之后，哈维等学者深入到《资本论》的文本分析，指出其研究方法与其叙述方法之间的差异，强调从经验到理论再回归现实的复杂性[3]。国内学者俞吾金重新澄清了《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指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抽象力，叙述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且二者之间存在时间次序上的关系[4]。赵磊则认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5]。刘志洪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研究方法[6]。

以上观点虽存在分歧，但基本遵循“表象具体 - 抽象 - 具体”范式的理论前提和解释路径。不可否认，《资本论》的序和跋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均为体现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最为重要的文献，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何为“具体”与“抽象”的科学内涵？若将马克思的抽象法单纯地理解为“表象具体 - 抽象 - 具体”的二元范式，那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有何本质区别？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跋文中说明其运用的方法时，刻意区分了“研究”与“叙述”方法及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的诸多差异。若忽略差异机械地阅读及研究这两个文本，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不同的解释和争论。

鉴于此，重新梳理和深入探究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不仅有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澄清学界长期以来的争论，更能为解读当代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

2. 科学抽象法：从“感性具体”到“思维具体”的中介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一节中，马克思对科学抽象法的基本内涵作出了初步阐释。因而，逐字逐句分析文本，对全面厘清该方法尤为重要。

马克思开篇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7], p. 700)不少学者将这句话当作马克思否认从“实在和具体”出发的证据之一，实则不然。仔细阅读这段文字，马克思在得出结论“错误”的判断之前，还有一句“似乎是正确的”，某种程度上说明从具体开始、

经济学上从主体人口出发并非完全错误，而是有正有误。下文中，马克思接着写道：“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 ([7], p. 700)显然，该语境下马克思将人口更多地看成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人口构成，都会对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将人口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必须考虑到阶级、性别、年龄、教育等多重因素。这种综合性分析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与动力，能够更加科学、客观地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可见，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否认从“实在和具体”出发的正确性，而是反对一种非辩证的、将复杂社会现象直接作为分析起点的直观方法。

进而言之，马克思这里所界定的“具体”有两个，一为“感性具体”，二为“思维具体”。“感性具体”是人们经由认识外界具体事物可获得的感性认识；“思维具体”则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完整且系统地再现，并在总体上理论性地把握事物的完整特征。其中，思维中的具体是对事物众多抽象规定性的辩证综合。可见，那种非辩证的人口分析，只达到了“感性具体”的层次，属于经验派的理智直观；而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则是包含阶级、雇佣劳动以及资本等丰富内涵的“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7], p. 700)。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具体”是对事物各个方面联系的综合规定性，是以许多规定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从“感性具体”到“思维具体”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抽象力”这一中介，因而现实的起点到头脑的再现，就已经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即“感性具体 - 抽象 - 思维具体”的过程。前一个“具体”为现实社会中理智直观的“感性具体”，后一个“具体”已是许多规定相结合的“思维具体”。重新界定“具体”的科学内涵，才能明白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理论起点。

“两条道路论”曾是国内学者验证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研究方法的最有力证据。马克思指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7], p. 701)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是指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范畴的方法；第二条道路，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是指思维中再现的从抽象范畴到“思维具体”的过程。学者们根据马克思文本中“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断言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此种文本解读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重回文本，在两条道路论之前，马克思明确指出：“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7], p. 700)可见，马克思从人口的“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出发，又回到人口，得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抽象法是通过运用抽象力实现“感性具体”到“思维具体”的飞跃。紧随着马克思所提到的“后一种方法”，文本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即具体不仅是现实的起点，也是思维中综合的结果，更是对感性现象的本质把握。只有经历了这两个过程，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此，“感性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思维具体”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必经阶段。只有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达到思维中的抽象，再运用抽象力达到思维中综合的具体，才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理论起点。

综上所述，17世纪部分经济学家明确了“第一条道路”中“表象”的“蒸发”，却未探知出“第二条道路”中思维里的“再现”的方法，显然属于半截子“辩证法”。对此，马克思也曾做过批判性分析，指出17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7], p. 700)。然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不止于此,运用“抽象力”中介从“感性具体”达到“思维具体”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起点,马克思的哲学绝不是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旧哲学,而是从人的实践出发,通过科学抽象回到实践的新哲学。

3. 科学抽象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科学抽象法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与黑格尔将“现实的事物”看成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7], p. 93)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科学抽象法生动地再现了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历史、不断地把观念的东西变为现实的过程。鉴于此,深入研究科学抽象法,须牢牢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回归《资本论》文本,重新厘清该文本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资本论》第一版序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8], p. 8)可见,“抽象力”既不同于显微镜式的理智直观,也不同于化学试剂反映的抽象公式,而是二者的综合,即作为以“实在具体”为起点再到头脑里“综合具体”的中介。这里的“抽象力”是一个需要操作化界定的核心概念。它并非简单的思维简化,而是一种复合性的认知机制。它是“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即在占有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提炼出抽象范畴,再运用演绎将这些范畴在思维中综合为具体的总体。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在形式上的差异,“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8], p. 21)可见,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并对其进行“显微解剖学”的全面分析,而材料的生命由观念反映出来,则表现为叙述方法。在此基础上,认识事物的第一步就是从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层面出发,搜集丰富的感性材料,分析其内在联系和外在形态,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恰恰是前文所述的“感性具体-抽象力-思维具体”的形成过程,即《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关于叙述方法,它在形式上表现为思维的再现,即把感性材料的“现实的运动”“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8], p. 22)并再现地还原出来。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7], p. 702)因此,从内容上看,思维的再现实际上是历史的运动过程。这就需要从《资本论》中最具基础性的“商品”出发,展开对历史运动逻辑的分析。

《资本论》的叙述是以“商品”为起点逐渐展开的,以“商品”这一“经济的细胞形式”([8], p. 8)分裂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体。至于马克思为何不以“资本”为起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而深入剖析,还将这一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命名为《资本论》,在“导言”中就已做出了具体的说明。马克思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7], p. 703)在“资本”范畴形成之前,存在着自身的历史运动过程,即“资本”经历了在“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本,”还不能称之为“资本”,而是表现为“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一章的第三节“价值形式或交换形式”中,清晰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8], p. 62)出发,考察在历史的原初形态下出现的商品交换,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接下来是伴随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8], p. 78),即市场的雏形,此时商品的价值在交换中可以体现在不同类别的多种商品中;再到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人们开始选用某一种商品的价值来衡量所有商品,如用20码麻布代替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等等;最终出现的是货币价值形式,一切商品的表现形式被具体化为货币。这也标志着人们抽象力的最终完成。马克思通过对这一历史运动的生动考察,再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唯物辩证法,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思维具体”不仅是“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

的思维结果，也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并不是借助于“抽象力”直接产生的，而是人们先通过“抽象力”在观念中形成了一般等价物，并通过交换实践将其具体化的结果。马克思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详尽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换言之，历史运动背后是人们创造力的集中反映，“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1, p. 295)因此，货币是商品“抽象”的“具体”，商品是货币“具体”的“抽象”。之后的演变进程中，“货币”又进一步具体化为“资本”，“资本”则改头换面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变为“利润率”，最终追根溯源至“地租”，每一次转变的背后都隐藏着人们将观念转化为现实。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内容上高度一致。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再现了其不断把头脑里“抽象”的观念变为现实的东西，进而继续抽象、实践(具体化)、抽象……的螺旋形上升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抽象法通过引入人们的实践活动，把黑格尔的思维运动过程变为了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运动过程，实现了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转变。

4. 科学抽象法：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方法指引

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中国经济思想以科学抽象法为方法论核心，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指导中国经济在新时代实现历史性跨越。这一过程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时代创新，也彰显了科学抽象法在解决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中的强大解释力。

首先，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科学抽象法的本质在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复杂性远超以往任何时期，全球化、数字化、绿色转型等多重趋势交织，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科学抽象法首先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在分析经济增速放缓时，不仅看到GDP数字的变化，更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国际分工重构、人口结构转型等深层因素中抽象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规律性判断。2013年以来，决策层通过大量调研和数据研判，摒弃了单纯追求速度的旧逻辑，提出“三期叠加”的重大论断，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存在，这正是通过“抽象力”中“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机制，从“感性具体”达到“思维具体”的典范。这种抽象不是简单的归纳，而是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加工，将零散的经济指标、区域差异、行业波动等感性材料，上升为对发展阶段转换的理性认识，为制定中长期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将理论规律转化为实践方略。实践“思维具体”的过程，就是将理论规律转化为实践方略的创造性工作。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就是科学抽象法在战略层面的集中展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从中国数十年的发展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教训中抽象出的最本质要求。例如，“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源于对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具体问题的反思，更抽象出经济发展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对立；而当这一理念具体化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时，又通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新能源产业等实践，实现了理论对现实的改造。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正是科学抽象法“感性具体-抽象-思维具体”的完整呈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不仅解决了“要不要发展”的问题，更科学回答了“如何发展”“为谁发展”的时代之问。

科学抽象法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运用尤为突出。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和单边主义抬头，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是对国内外经济关系进行科学抽象的典型例证。通过分析全球产业链重构、国内市场潜力、科技自立自强等多元感性因素，抽象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工作方针。这一研究判断既不同于封闭自守的内向思维，也有别于过度依赖外需的传统路径，而是把握住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殊国情的辩证统一。在具体实施中，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需求侧管理，从打造统一大市场到建设自贸试验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将抽象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2020~2022年间，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外贸规模连续突破历史新高，印证了这一战略的前瞻性。这充分说明，科学抽象法不是书斋里的思维游戏，而是指导经济实践的重要工具。

在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产权界定与激励机制为核心分析工具，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精细的微观解释。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视为通过明晰土地经营权降低了监督成本，平台经济监管则被理解为对数据产权的重新界定。这类分析在操作层面具有极强解释力，能够精准揭示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条件。然而，科学抽象法的视角与之形成深刻的互补。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静态的制度均衡与个体行为分析，而科学抽象法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将制度变迁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矛盾运动中把握。以“新发展理念”为例，新制度经济学可将创新理念还原为知识产权保护、绿色理念还原为排污权交易设计，却难以说明五大理念为何构成有机整体，以及它们如何内生于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矛盾转化之中。科学抽象法通过对“感性具体-抽象-思维具体”辩证运动的揭示，呈现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归实践的总体性逻辑，从而在宏观战略层面提供了对新制度经济学微观机制的有效补充，使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兼具操作性与历史感、精确性与总体性。

最后，科学抽象法还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强调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曾存在对西方模型盲目套用的现象，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分析中国经济，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在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科学抽象法为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方法，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等原创性理论。例如，对精准扶贫实践的理论升华，不仅抽象出“六个精准”的工作机制，更形成了涵盖产业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维度的反贫困理论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些理论创新不是概念推演的结果，而是通过对亿万人民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再回到实践中检验完善，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科学抽象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思想武器。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没有停留在表象层面的贸易争端，而是抽象出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和“需要完善”的现实要求，提出国际社会应共同探索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治理方向。这一理念既包含对全球发展失衡本质的深刻洞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结构的矛盾，又具体化为跨国经济合作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实践平台。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从各国减排承诺与实际行动的差距中，抽象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具体化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绿色国际合作等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种从国际关系具体实践出发，抽象出治理规律，再转化为合作方案的方法，体现了科学抽象法的全球视野。

科学抽象法的当代价值更体现在其开放包容的理论品格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将人简化为“经济人”假设不同，中国的经济实践始终关注真实、具体的人。中国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从亿万劳动者、消费者、创业者的实践中，抽象出人民主体地位的核心理念，再具体化为就业优先政策、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等民生举措。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中，科学抽象法同样展现出对多元差异的包容性整合能力。中国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若机械套用统一的经济模型，往往难以兼顾地方实际。通过运用科学抽象法，决策者从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多样化的区域实践中，抽象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共性方法论原则，再将其具体化为差别化的财政转移支付、产业布局优化和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工具。这一过程既尊重了

各地特殊性的“感性具体”，又通过抽象力提炼出普遍性规律，最终在“思维具体”层面实现了区域政策的精准化与包容性的统一。这种尊重人民主体性、包容多元差异的科学抽象，超越了见物不见人的狭隘发展观，彰显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优势。

回望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GDP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到人均收入跨过一万美元门槛，每一项成就背后都闪烁着科学抽象法的智慧光芒。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越是复杂局面，越需要运用科学抽象法这一认识工具，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科学抽象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方法，也是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的思想基础。在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科学抽象法必将在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构建新理论中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为人类探索更加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5. 结语

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重新阐释不仅还原了其唯物辩证法的本真面貌，更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生机。通过厘清科学抽象法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进路，破除了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的单向机械式解读，确立了“感性具体-抽象-思维具体”螺旋上升的方法论范式。这一范式深刻表明了经济范畴的本质是历史运动中人的实践产物，从商品到资本的逻辑演进实为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创造社会关系的现实进程。在新时代，科学抽象法成为解读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分析方法。面对全球化变局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中国经济思想运用“抽象力”从具体实践中提炼规律，又将理论转化为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方略，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超越。脱贫攻坚、平台经济治理等案例证明，唯有立足人民主体性，通过“观念抽象”与“实践具体化”的互动，才能构建兼具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经济学说。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并进的时代背景下，更需以科学抽象法穿透表象，把握“质”与“量”、“危”与“机”的辩证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的理论动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遗产，终将在人类探索更合理社会形态的征程中彰显永恒价值。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14-42.
- [2] 路易·阿尔都塞. 读《资本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28-31.
- [3]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11-12.
- [4] 俞吾金. 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6): 16-24.
- [5] 赵磊, 赵晓磊. “从抽象到具体”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吗?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11): 5-15.
- [6] 刘志洪.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再阐释[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 10(10): 69-78.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